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笔谈)

编者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使得“文化自觉”的问题日益紧迫地突显出来。因为只有首先获得了“文化自觉”,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才有可能最为合理地实现融合,才有可能最为持久地推动发展,从而逐步达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为此,本刊创办了“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学术专栏,吁请国内外学者积极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自觉;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3-0015-09

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

费 孝 通

(全国人大常委会,北京 100000)

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具体的采用这个名词是在 1997 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的历史则相当长了,我想大家都了解自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

我在 70 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我在早期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80 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养鹿为主。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 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主的赫哲族,存在问题是一样的。中国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 22 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化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

面临的问题。我回想起在上世纪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对话。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并认为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和答复这些问题,譬如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我们交谈时涉及几个实例,一是谈到重视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一下子解放出来了。以后在农村工业化中,又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同时让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不同的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能不能相容共处的问题,还有文化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可以把不同制度凝合在一起的力量,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三是“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入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四是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历史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套破坏得太厉害,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我看这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也是否定不了的。

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的经验性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去年美国的“9.11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此后事态的发展使我很失望,这种“以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文化精神的存在,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不同国家的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于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中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各种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

张 邕 之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84)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是两个概念,这二者有什么关系?我提出以下四点供参考。

第一,文化自觉通过知识分子促进社会发展。知识分子是知识和文化的拥有者,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自觉的代表。从历史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和方略,这些得以实施,便产生推进社会的客观效果。当然,不能狭隘地认为只有治国安邦的具体方略才使社会进步,更为抽象和更带普遍性的思想理论,不但表现了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而且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耗费自然资源(森林首当其冲),其危害性更为严重。唐代诗人杜牧抨击秦始皇暴政的名篇《阿房宫赋》所云:“蜀山兀阿房出”,决非一朝一代的特例。此外,战乱焚林毁堤的惨状,在古代中国也层出不穷。较为经常起作用而又少为人所谴责的,则是人口增加导致土地过度垦殖,使中国的生态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恶化速度渐增,森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面积消失,曾经林木草场茂盛的黄河河套地区的沙漠化,都是突出表现。中国的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汉以降,农耕人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两路开垦农田,造成森林、草场的毁坏,终致这些原本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地带盐碱化和沙漠化。

如此说来,中国西北地区一系列绿洲终于被漫漫黄沙所淹没,并非始于工业文明时代。早在农业文明时期,主要是高度农业文明时期,生态的恶化已经愈益加快步伐。这提示我们:不要把产生“天人合一”理念的农业文明加以美化,那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由于生产力落后和认识的局限,不可能克服对自然的盲目性,在愚昧和贫困两大病魔的逼迫下,自然生态的被破坏,已经频频发生,不过规模和力度不如现代而已。因此,某些“回归主义者”主张的退回前工业时代,绝非人类文明的正途。

就现代世界而言,也并非工业愈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愈严重。反之,第三世界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和初级工业化滥用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非洲的拉各斯、亚洲的加尔各答、北京、兰州等城市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污染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初期的生态恶化之后,时下的生态环境则进入良性转换阶段。如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因工业污染而成为没有鱼类的河道;20世纪中叶以来,经过治理,泰晤士河变得洁净,两岸垂钓者每每能获得肥硕的鲑鱼。美国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曾以空气污浊闻名,现在已是世界上生存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这都说明,当现代人在理念上实行调整之后,便有可能将科学技术的伟力应用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古代“天人合一”的美好理想,逐步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

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中华智慧重视人伦,主张道德自觉,形成一种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也是中华智慧吸引一些西方哲人之所在。中国固有的仁学传统承认人的独立意志,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在社会规范中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都闪烁着人本精神的光耀。然而,中华智慧并没有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社会长期运作的却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其为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束缚下,广大民众的自由被剥夺,一些起码的生存权利也被禁绝。同时“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官本位”、“任人惟亲”更成为沿袭至今的病疾。这些问题的克服,当然有赖中华智慧内部健康因素的发展,但尤其需要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其间西方智慧的补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就伦理层面而言,中华智慧中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与西方强调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中华伦理“成圣成贤”的修养论,需要西方文化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的补正。

总之,那种无视中华智慧现实意义的认识自然有害,那种以为中华智慧可以提供克服现代病的现成灵丹妙药的认识也无济于事。而中华智慧与西方智慧的互补相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友好对话,促成人类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全面发展,方有可能创建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当代哲学有张岱年“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的主张,方为可取的方略。

Cultural Self—knowledg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versation by Writing)

Abstract: Leaderette; The cultural conflict and amalgamation of different regions resulted from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kes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self—knowledge increasingly conspicuous. Only when the cultural self—knowledge is attained first, the amalgamation can be realized most reasonably, the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most sustainably, thus gradually realize the ideal condition which Mr. Fei Xiaotong advocated that “Beautify one’s own beauty, beautify other’s beautify, beautify all the beauty, then comes the great harmony”. For this purpose, we establish the academic column of “Cultural self—knowledg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come the scholars both in and out of China to participate the discussi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elf—knowledge; Social development